

外国历史小丛书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商务印书馆

宋祜焕



外国历史小丛书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宋 禎 焕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2055/02

责任编辑：魏黎明

封面设计：范贻光

外国历史小丛书

CHÁOXIĀN JIǍWÚ NÓNGMÍN ZHǍNZHēNG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宋 祯 煥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781

1987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 千

印数 1,300 册

印张 1¹/₂

定价：0.25 元

目 录

一	农民战争的酝酿·····	2
二	农民战争的爆发·····	10
三	农民战争的胜利开展·····	16
四	全州和议和执纲所的建立·····	26
五	农民战争的再起·····	30
六	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38

1894年朝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这次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在朝鲜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朝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伟大爱国创举，是近代朝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发生在1894年，即甲午年，所以一般称之为甲午农民战争，或1894年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还同朝鲜宗教东学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奋起斗争的农民和农民军领袖很多又都是东学教徒，所以，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史家一直把甲午农民战争诬指为“东学乱”或“东学党之乱”。但是，农民起义一爆发，就立即冲破宗教思想的各种束缚和东学教上层集团的各种阻挠，很快发展为轰动内外的全国性农民战争。起义农民在全琫准等人的领导下，高高举起“辅国安民”、“逐倭灭洋”的大旗，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

甲午农民战争达到高潮时，清朝统治阶级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去朝鲜，企图一举扑灭农民战争的烈火。日本政府也趁机派兵朝鲜，寻衅发动中日甲午战

争,并残酷地镇压了农民军。因此,这次农民战争不仅在朝鲜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在19世纪末期远东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回顾和学习这段历史,可以加深对朝鲜人民爱国斗争传统的了解,同时还可以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远东形势的轮廓。

一 农民战争的酝酿

19世纪末期,是朝鲜历史上灾难深重的年月,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夜。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李氏朝鲜封建王朝已经走到尽头,内外交困。对内,腐朽的封建制度分崩离析,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对外,备受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朝鲜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都拼命向外扩张,它们在远东的殖民地掠夺战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亚洲孤儿”,起步很晚。但是,其发展却十分迅速,而且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质,富于侵略性,一开始就对朝鲜怀有野心。

1863年12月,李朝第25代国王哲宗死,无嗣,由王族兴宣君李昰应次子李熙继承王位(高宗),其生父李昰[shì,音是]应被封为大院君。新王高宗即位年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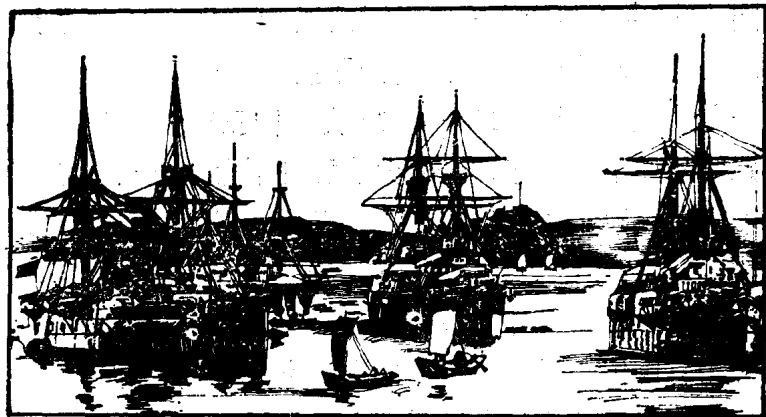
十二岁，不能亲政，由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9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先是美国和法国对朝鲜发动了多次武装进攻，但当时朝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大院君实行“锁国攘夷”政策，大力加强国防，使美法侵略者的企图未能得逞。大院君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策，但在当时朝鲜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抗击外敌，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873年11月，国王李熙在王后闵妃的怂恿下，宣布亲政，将大院君赶下台。之后，朝鲜国内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闵妃一派贪婪自肥、腐败无能，为了维护其一身一族的反动统治，对内横征暴敛，欺压人民，对外屈服外敌，一味迎合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闵妃一派统治阶层的这种腐败、软弱和无能，恰好为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蓄意侵略朝鲜，多次挑起事端，闵妃一派掌权之后更加猖狂。1875年9月，日舰“云扬号”非法驶入朝鲜海域，在江华海面再次制造事端。朝鲜海防士兵忍无可忍，鸣炮还击。于是，日本侵略者以早就准备好了的优势兵力对岛上草芝镇炮台和永宗岛连续发动进攻，并在永宗岛登陆，烧杀劫掠，然后退去，史称“云扬号事件”。日本政府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派七艘军舰，胁迫朝鲜订约，1876年2月，闵

妃一派在江华岛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从此，朝鲜被迫打开大门，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江华条约》成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

日本侵略者在强行签订《江华条约》后，最大限度地利用条约所规定的各种特权，疯狂地掠夺朝鲜，使朝



日本军舰在朝鲜海域横冲直撞

鲜经济濒于破产，并千方百计加强在朝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粗暴地干涉朝鲜内政，严重践踏了朝鲜的主权。其后，英、美、俄、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先后同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竞相掠夺，使朝鲜转眼间成为“远东的巴尔干”。

在这样一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为了自身的生活出路，不断开展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同时，爱国的军人和

知识分子以及少数开明官吏，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也展开了积极的斗争。1882年7月汉城的士兵起义（史称壬午兵变）和1884年12月的甲申政变，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而以闵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则进一步走向反动，使国家处于不可收拾的地步。

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政府制造种种口实，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汉城条约》（1885年1月），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侵略势力。1885年4月，日本还同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在朝鲜攫取了与清政府完全对等的地位和权利。

中朝两国是一江之隔的友好邻邦，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友谊一直是两国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流。到了近代，中朝两国彼此都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两国的命运都危在旦夕。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在1882和1884年，清朝统治阶级站在朝鲜大地主、大封建官僚一边，曾两次兴师动众前去镇压汉城士兵起义和甲申政变，这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在朝鲜人民面前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当然，清朝统治阶级生怕日本以琉球为先例^①吞并朝鲜，防日反日之心不是没有，但

^①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对琉球怀有野心，于1879年公然吞并，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其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每每刺激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口实。从历史上看，由于中朝两国的传统关系，清朝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一直优于日本，但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这种优势便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征服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准备，千方百计地掠夺朝鲜，成了朝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侵略者每年从朝鲜掠夺大量的农产品，使朝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朝鲜通史》记载，在1889、1891和1892年短短的三年中，朝鲜输出到日本农产品的总额高达六百六十一万四千零八十三美元。仅粮食一项，朝鲜的对日出口，1890年比前一年增加了二十五倍，1891年比前一年增加了二十七倍。日本侵略者的这种强盗行径，使朝鲜人民，尤其使朝鲜南部地区的农民无以为生，长年处于饥饿线上。

与此同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残暴日见其甚，宫廷和朝阁完全变为阴谋欺诈的巢穴。朝鲜农民不仅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还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村成了鱼肉百姓的场所。广大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起义。据李朝政府的官方记载，从1885到1894年初，规模较大的“民乱”就发生三十八起。1893年末到1894年

初,这种“民乱”在全罗道一带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就在这时,长期受压迫的东学教徒也积极开展活动,使李朝政府深感不安。所谓东学,是指1860年由庆尚道庆州府人崔济愚(号水云)创立的朝鲜新教。东学教杂取道、佛、儒三教教义,提出“人乃天”的思想,与“西学”(即基督教)相抗衡,自称“东学”。可见东学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排外色彩乃至一定的反侵略倾向。东学教的信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活动地区主要是朝鲜南部。东学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民间的农民秘密社团。它借宣传宗教来组织民众,一面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先遣队基督教,一面反对国内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因此,东学教刚一产生,政府就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加以严厉的镇压,将教祖崔济愚及其他许多东学教徒以“惑世诬民”之罪处死。

但是,政府的镇压不仅未能使东学教屈服,反而使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分散在各地的东学骨干不断地发展信徒,扩大组织。结果,到第二代教主崔时亨(号海月)时,东学在全罗道、忠清道一带的地盘大为扩大,信徒曾达十余万人,它的教义也自成体系,成为当时朝鲜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东学教上层集团为了摆脱政府的压迫、争得合法地位,于1892和1893年开展“为教祖伸冤”的运动。

1893年1月，几千名东学教徒在全罗道参礼驿举行集会，要求全罗、忠清两道监司为教祖崔济愚平反昭雪。两道监司看到群情激昂，不敢贸然采取高压手段，当即表示今后在自己的管区内决不迫害东学，至于为教祖平反一事，地方官究无权受理。东学上层集团看到官方态度不象从前那样强硬，便决定进京，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1893年3月，四十多名东学教骨干在汉城光化门前长跪顶礼，为教祖崔济愚伸冤请愿三天三夜。同时，不少东学教徒在日本使馆、美国教堂以及外国人居住地张贴标语，要求外国人撤离朝鲜，闹得汉城的气氛一时十分紧张。虽然这次请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扩大了东学教的影响。

1893年4月，成千上万的东学教徒在忠清道报恩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即报恩聚会。在这次集会上，“为教祖伸冤”的口号已经不见了，与会者举起了“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并将以“忠君爱国”和“逐倭灭洋”为主要内容的文告张贴在报恩郡衙门前。文告写道：“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迹，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稷〔shǔ jì，音蜀季〕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返有悔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视若恬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异于火薪之上哉？……生等数万，同力誓死，扫破倭洋，欲

效大报之义。”

报恩聚会提出“扫破倭洋”的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罗、忠清、庆尚、京畿、黄海、江原等道农民和东学教徒纷纷赶来参加集会，与会者达两万余人。可见，东学教的“伸冤”运动，不管东学上层集团的动机目的如何，它已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

李朝政府获悉报恩聚会消息后，急派鱼允中为宣抚使，前去劝诱与会者立即解散。接着，国王高宗亲自下诏，劝诱与会者解散，并企图调动军队前去镇压。东学上层集团看到政府的态度强硬，立即软了下来，命令与会者立即解散，而他们自己则于5月17日夜里悄悄离开报恩，逃跑了。

报恩聚会本是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绝好机会，但由于东学上层集团的软弱投降和背信弃义，轰动一时的报恩聚会半途而废了。但是，它在提高农民觉悟和组织农民方面，却起了不小的作用。以这次集会为转折点，广大农民群众逐渐和东学的基层组织取得联系，开始同东学的下层教徒拧成一股绳了。于是，农民和教徒们在邻近的各“包”和“接”^①频繁接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正在酝酿着。

^① “包”与“接”都是东学教的基层组织。

二 农民战争的爆发

1894年春天，在全罗道的古阜、泰仁、益山等地，同时发生了几起农民起义。其中，古阜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成了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而古阜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则是郡守赵秉甲的横征暴敛。

赵秉甲于1892年受命到古阜郡上任以后，依仗闵妃一派的权势，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使人民无以为生。赵秉甲刚一到任就宣布，长期罢耕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种，并且免收田税。但到秋后，他却征收高额田税。农民受了骗，非常气愤，第二年就不再耕种罢耕地了，但赵秉甲依然征收那一部分田税。不但如此，他还为了给其死去的父亲（生前曾任泰仁县监）修碑立阁，向古阜郡民强征课银钱千余两，甚至以“不孝之罪”、“不睦之罪”等莫须有的罪名，强索赎金二万余两。

赵秉甲是个货真价实的贪官污吏，为了搜刮民财，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万石淤事件。万石淤是古阜郡东津江南岸的一座大贮水池，长期为古阜、泰仁两地农民灌溉使用。郡治当局凭它强征高额水费，农民早已怨声载道，曾多次要求当局减低税收。但新任郡守赵秉甲充耳不闻，反而强迫农民

在旧池附近另修一座根本不必要的新池，用此加收水费来饱填私囊，给农民群众增加了额外负担。另外，古阜位于海岸线上，当地人民备受日本商人的盘剥，雪上加霜，走投无路。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勒索和日本商人的掠夺行为，古阜一带的农民忍无可忍，于1893年末曾两次奋起反抗。以全彰赫为首的四十多名农民直奔郡衙，向郡守赵秉甲提出抗议，要求他免收新池的水费以及其他苛捐杂税。但赵秉甲却诬指四十多名农民是“乱民”，当即驱散，并将带头的全彰赫扣留毒打。几天之后，全彰赫死于非命。赵秉甲的暴虐行为引起古阜郡农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心用暴力手段惩除这条毒蛇，而站在前列的便是全彰赫之子全琫准。

全琫准出身于没落的农村两班^①家庭，受过一定的教育，后来同父亲一起长期在泰仁县“以学究为业”，“训导若干童蒙”，在泰仁、古阜一带享有较高的威信。全琫准生长在乡下，家境清贫，从小过“朝饭夕粥”的生活，成年后一度在汉城、全州等地流浪，目睹人民的疾苦，早就对统治阶级切齿痛恨，现在看到父亲被害，更是压不住心头怒火。

全琫准是古阜一带的东学接主（即东学教的地方

^① 两班，指官僚地主阶级。

首领),他一面同教友郑益瑞、金道三等人计议,一面在东学教的地方首领和下层道徒之间奔波,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1894年2月15日夜,全琫准同郑益瑞、金道三等人一起,把三百多名强壮的农民和教徒集结在泰仁县舟山里的东学接主崔庆善家中,然后按照预定计划,率领他们向古阜郡方向前进,途中有七百名农民和他们汇合,于20日拂晓开赴古阜郡。赵秉甲闻变逃之夭夭,起义农民一举占领了郡衙。愤怒的农民焚毁了地契和奴婢文籍,并打开兵器库,夺取了武器。起义农民还砸开牢门,释放了无辜被捕的农民和教徒,打开粮库,把粮食分给农民。他们还处决了几名作恶多端的官吏,捣毁了他们早已恨之入骨的万石淤新池。至此,起义农民暂时解了心头之恨,以为斗争目的已经达到,十多天后便陆续离队散去。全琫准看到农民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难以使起义进一步发展,他自己也只好躲了起来。这样,古阜农民起义仍未超出地方性“民乱”的范围,暂时告一段落。

古阜农民起义给了全琫准等人以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起义,全琫准等农民领袖认识到:农民群众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其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暴力斗争,才能有效地打击反动统治阶

级。特别是，古阜农民起义使全琫准认识到，要广泛地发动群众，使起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就得有一个正确的斗争口号和明确的战斗目标，否则就将前功尽弃，一事无成。于是，全琫准同孙华仲、金开南、金德明等人取得联系，奔走在附近东学接主和农民之间，进行更加细密的起义准备工作。

古阜农民起义对朝鲜南部各地农民的影响很大。古阜农民起义的消息使全罗、忠清两道的民心顿时沸腾起来，邻近各郡县的农民更是跃跃欲试。

李朝政府获悉古阜农民起义消息，立即罢免了赵秉甲，改派朴元明为郡守，随后又派长兴府使李容泰为按察使^[hé, 音核]使前去料理事宜。但是，李容泰和朴元明比赵秉甲还狠毒，他们一到任，便大施淫威，声称要彻底“讨平暴徒”。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说抢就抢，为所欲为。他们的这种野蛮行为不仅限于古阜一郡，还殃及泰仁、金沟、金堤、扶安、茂长等邻近郡县，使那里的农民群众蒙受空前的灾难。

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和残酷掠夺，激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古阜、泰仁一带的农民早已剑拔弩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全琫准看到时机成熟，便向邻近各郡县的东学接主发出通文，号召他们为实现“辅国安民”、“逐倭灭洋”的宿愿，同农民一道奋起斗